

分权与限权：皇权治下的宋代翰林学士与宰辅政治

唐春生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0047)

摘要:宋代翰林学士与宰辅的关系比较微妙,在宰辅的人事任免上,翰林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力;翰林学士也有可能成为宰辅,对在任宰辅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由于翰林学士地位特殊,宰辅重臣对这一群体是有所忌惮的。权臣与翰林学士相交结,对两宋政治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两府不得因私晤见翰林学士的禁令被打破之后,其影响更为明显。

关键词:宋代;皇权;翰林学士;宰辅政治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7)04-0033-05

宋代翰林学士对宰辅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翰林学士的选拔上宰辅可起到荐举的作用,二是翰林学士日后可出任中书门下或枢密院的主要长官,厕身于执政集团之列。笔者对此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可参拙著《翰林学士与宋代士人文化》^[1]相关部分的内容及《“以文驭武”:宋代翰林学士与宰辅的选任》^[2]一文。本文拟再就此问题作一探究。

一、翰林学士进退宰辅与翰林学士的为宰辅

曾巩说:“禁林任亲地密,于夫经营庶务,进退大臣,未尝不预咨询。”^[3]卷20,第320页就是说,作为帝王的侍从顾问,学士院(禁林)的翰林学士可对现任或拟任的宰辅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其拔擢黜退产生一定的影响。太祖时,与宰相赵普不睦的翰林学士卢多逊“每召对,多攻(赵)普之短”^[4]卷264《卢多逊传》,第9118页,没多久,赵普便罢相出镇河阳。虽不能说卢多逊的中伤就是赵普出镇河阳的主要原因,但无疑对本已备受太祖猜忌的赵普来说是雪上加霜。仁宗朝,翰林学士吕溱上疏论宰相陈执中奸邪;虽然吕氏因此以待读学士出知徐州,但毕竟迫使仁宗罢免了陈执中^[4]卷320《吕溱传》,第10401页。在任用参知政事王尧臣为枢密使一事上,也可看出翰林学士的影响力:由于起草诏制的翰林学士胡宿“固抑之”,仁宗也只好放弃这一人事安排^[5]卷187,第4512页。

如果说上述卢多逊等人只是通过进言的方式来影响朝廷对宰辅的任用,那么,翰林学士钱惟演则是直接向皇帝建言宰辅的人事安排。《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癸亥载:

是日,惟演又力排寇准曰:“准自罢相,转更交结中外,求再用……不如早令出外。”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闻准已具表乞河中府,见中书未除宰相,兼亦闻有人许以再用,遂不进此表。”上曰:“与河中府何如?”惟演乞召李迪谕旨,上曰:“李迪何如?”惟演言:“迪长者,无过,只是才短,不能制准。”因言中书宜早命宰相。上难其人。惟演对:“若宰相未有人,可且著三两员参知政事。”上曰:“参政亦难得人。”问今谁在李迪上,惟演对:“曹利用、丁谓、任中正并在李迪上。”上默然。惟演又言:“冯拯旧人,性纯和,与寇准不同。”……后三日,拯遂拜枢密使,盖用惟演之言也。迪既除宰相,而准为太子太傅、莱国公如故。

钱惟演的说辞,真宗虽然没有全盘接受,寇准的地位仍旧,参知政事李迪也重用为相,但他推荐的冯拯也进入了执政集团。七天后,钱惟演又对真宗说:“中书不当止用李迪一人,盍迁曹利用或丁谓过中书?”“丁谓文臣,过中书为便。”^[5]卷96,第2206—2207页最终,丁谓擢任昭文相(首相),曹利用虽然没能进入中书,但仍为枢密使,并加同平章事衔。先前已为枢密使的冯拯则于同年十一月升任集贤相。

收稿日期:2017-03-06

作者简介:唐春生(1964—),男,湖南武冈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两宋文史。

南宋时,翰林学士进退宰辅之事并不多见(这与南宋多权相有关),但也不乏其例。孝宗时,周必大“在两制,除拜有非其人者,据正争执”。张说除签枢,直学士院周必大拒绝为其草撰辞免不允诏书,以表达不同意见,尽管并没有成功^[6]李壁《周文忠公行状》,第293册,第399、409页。再如,右丞相史嵩之守丧期满,理宗“有向用之意”,朝中部分台谏官员对此不满,翰林学士李韶也上疏指出:“今陛下不能正奸臣之罪,其过不专在上,盖大臣百执事不能辅天子以讨有罪。”理宗只好命史氏致仕^[7]第1613页。周必大、李韶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势倾天下的权相,所以翰林学士才能据理力争。

在宋代,从翰林学士中选拔宰辅重臣较为普遍。据《群书考索续集》的统计^[8]卷34,第1116页,自太祖建隆至神宗熙宁年间,共108位翰林学士,为相者21人,占翰林学士总数的19.4%。自高宗建炎至孝宗淳熙年间,共76位翰林学士,为相者8人,占10.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也有统计^[9]甲集卷九,第178页,自高宗建炎元年至宁宗嘉泰二年,翰林学士共70人,为宰辅者40人,竟高达57%。据笔者统计,两宋共有翰林学士371人,其中,官至宰辅者163人,占44%。可见,学士院堪称宰辅诞生的摇篮^[2]。

翰林学士的仕宦前景,对在任的宰辅大臣之政治地位无疑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况且他们又是帝王的“私人”,宰辅对这一群体自然有所忌惮。帝王重用翰林学士时,有的宰辅重臣则千方百计予以阻挠。太祖时,宰相赵普独专朝政,太祖屡欲用翰林学士窦仪为相。赵普忌其刚直,联合其他大臣排挤之,打消了太祖用窦氏为相的念头^[5]卷7,第182页。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叶清臣为仁宗所器重,“欲大用”之,但他素为宰相陈执中所不喜^[10]卷3,第2633页,最终被罢出知河阳。熙宁变法中,神宗将“大用”翰林学士滕甫,却为执政王安石所忌,滕氏屡遭排挤^[11]卷15《滕公墓志铭》,第459页。南宋时,蔡崇礼在学士院前后五载,高宗“屡欲大用”,为权臣秦桧“中沮不果”^[12]附录《氏族言行录》。兼直学士院的魏了翁,理宗“将引以共政,而忌者相与合谋排摈”,让魏氏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离开了权力中心^[4]卷437《魏了翁传》,第12969-12970页。凡此说明,在“私人”与权臣之间,皇帝似乎更信任后者,以维持君相一体,相互依存的格局。

二、宰辅与翰林学士的互为利用

作为帝王“私人”的翰林学士,其政治态度、立场可或多或少地影响帝王,且这类人日后较易成为宰辅;而翰林学士的选任与晋升至执政,又离不开现

任宰辅的提携。因此,某些宰辅与翰林学士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而相互结盟。结盟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供职学士院后的翰林学士与宰辅的结盟。宰辅处于中枢权力机构,是君相一体大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其政治资源充裕;为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某些翰林学士主动投靠宰辅重臣作为政治上的靠山,为其尽心效力。哲宗朝的翰林学士黄履向来与宰相左仆射蔡确、门下侍郎章惇相勾结,当蔡、章二人厌恶某人时,他即排斥打击之^[4]卷328《黄履传》,第10573页。高宗时,秦桧对金的议和遭到不少人反对,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勾龙如渊建议任用可靠之人出任台官,相机打压政见不同者。勾龙如渊主动出任御史中丞,替秦桧分忧^[13]卷123,第1996页。宁宗时,依附韩侂胄的直学士院李壁,使金归来称金人骄惰,只求苟安,以为“机会可乘”^[6]李壁《上殿札子》,第293册,第381页。又说:“敌中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且有内变。”^[14]乙集,第88页曲意迎合韩氏北伐的军事冒险主张。

二是宰辅尤其是权臣援引同党故旧为翰林学士。一般说来,翰林学士的任命大权掌控在帝王手里,但可征求大臣意见以做参考。史载宋太宗“每命一词臣,必咨访宰相”^[5]卷27,第623页,“祖宗之法”既如此,此后翰林学士的人选自然少不了宰辅的举荐,选拔出来的翰林学士就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党徒。仁宗朝的王洙之为翰林学士,也是因为依附宰相陈执中、刘沆而为他们拔擢的结果^[4]卷294《王洙传》,第9816页。神宗时的元细,曾在王安石父亲王益幕中为官,与其父关系极为密切,王安石荐其为翰林学士^[15]卷上,第4页。王觐为宰相曾布门人,徽宗时被其“引用”为翰林学士^[6]陈次升《奏弹曾布第四状》,第102册,第412页。蔡京专政时,刘曷、强渊明、张商英、王黼、叶梦得、邓洵仁、张康国、张康伯、林摅、薛昂、蔡薨、蹇序辰均因属蔡京党羽而为翰林学士。

选用私人同党为翰林学士,南宋的秦桧比蔡京表现得更为突出。秦桧的庶子秦熈及其兄弟秦梓均为翰林学士。故旧党羽为翰林学士的更多。永嘉人林待聘,人称秦桧门客,在秦桧罢相出知温州后,二人结下了更为特殊的亲密关系,他后来为给事中兼直学士院。翟汝文知密州时,秦桧为其僚属,翟氏为翰林学士乃秦桧引用的结果。杨愿乃秦桧之心腹,秦桧再相后,他以给事中兼权直学士院。秦桧还注重从老乡、同窗中拔擢翰林学士。范同、段拂、巫伋与秦桧为同乡兼同窗,三人均为翰林学士。继秦桧之后的权臣同样“率用私人”,并“浸以成俗”^[6]杜范《相位五事奏》,第320册,第200页。宁宗时,韩侂胄欲使

心腹苏师旦为节度使,与苏氏关系甚好的易祓以国子司业兼直学士院^{[16]卷11,第200页}。理宗朝的郑清之为翰林学士,是因为他与权相史弥远是政治上的盟友,共同辅佐过理宗继位^{[4]卷414《郑清之传》,第12420页}。理宗、度宗二朝为翰林学士的冯梦得则是权相贾似道宣抚京湖时的下属^{[17]卷23,第239页}。

被位高权重的宰辅用为翰林学士的,在政治上对宰辅也投桃报李。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政治权力运行中宰辅的坚定支持者。这类翰林学士与重用过他的宰辅声气相通,行事上配合默契。真宗朝,翰林学士钱惟演在丁谓为相一事上对真宗的建言(详上)即其例。再如力推新法的王安石迫于保守派的压力请求辞职,翰林学士吕惠卿命其党羽每天投匭上书挽留之^{[4]卷471《吕惠卿传》,第13706页};秦桧担心韩世忠、张俊、岳飞难以控制,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献计,他们改任枢密院大员,剥夺了领兵之权^{[13]卷140,第2247页}。

二是草拟诏制时挟带私货。代帝王言的翰林学士草拟诏制时本应出于公心,有人却替权臣代言,成为政治权谋下的舆论造势与打击政敌的工具。蔡京拜相时,翰林学士张商英所草诏麻“过为褒美”^{[4]351《张商英传》,第11096页};秦桧除太师,翰林学士程克俊草制曰:“庙算无遗,固众人之所不识;征车远狩,惟君子以为必归”,吹捧秦桧的政治智慧与忠君体国^{[13]卷147,第2360页};宁宗庆元初,因依附韩侂胄而为直学士院的傅伯寿“草诏妄诬善类”^{[18]卷40《傅伯寿传》,第432页},迎合了韩侂胄打击道学的政治需要。

结交宰辅的翰林学士,自然希望他的付出能获得政治上的回报,而宰辅权臣为了结盟更为牢固,也在仕途前程上对翰林学士有所提携,双方具有互益性。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因与宰辅权臣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而位至执政的不在少数。太宗时,翰林学士张洎谄事宰臣寇准,“准力推轂之,故同秉大政”^{[7]卷2,第75页}。神宗时,翰林学士吕惠卿对王安石主导的新法多有发明,王氏力荐其为参知政事。徽宗时的翰林学士林摅,使辽时秉承蔡京之旨意,有意激怒辽以生事端,他因此出知颍州。后来林摅召为开封尹,在处理张怀素妖事案中,他又庇护了与此案有染的蔡京,“京深德之”^{[4]卷351《林摅传》,第11111页},使其“骤至执政”^{[4]卷352《余深传》,第11121页}。另一翰林学士张商英,也凭借与蔡京的关系出任尚书右丞、左丞。南宋高宗时期,依附权相秦桧的翰林学士位至执政的不少,如翟汝文、孙近、楼炤、范同、程克俊、段拂、秦熺、巫伋、汤思退等人。宁宗时的直学士院李壁也因迎合

韩侂胄的北伐主张,致“韩大喜”,因此“居政府”^{[14]乙集,第88页}。

翰林学士获得的这种政治回报是有着宰辅的算计的。章惇为相,翰林学士曾布草制“极其称美,冀惇引为同省执政”,章惇有所忌憚,“止荐居枢府”^{[4]卷471《曾布传》,第13715页}。章惇荐举另一翰林学士林希为同知枢密院,目的是“伺察”已与其不相能的曾布^{[4]卷343《林希传》,第10914页}。宁宗驾崩,丞相史弥远夜召直学士院程秘草拟诏书,废宁宗所定的继承人赵竑,而立赵昀(理宗)。“初许秘政府”,由于杨皇后赐其草诏之润笔过于丰厚,史弥远心生不满,故而未履行程氏为执政之承诺^{[4]卷422《程秘传》,第12617页}。

宋人对翰林学士因草诏制而获致执政官称为“润笔执政”^{[19]卷上,第4481页},程秘差点就获得了这份丰厚的酬劳。直接通过草制谀颂在任宰辅而获执政官的翰林学士虽然不多,但仕途因此有所升迁者不乏其人。高宗时,秘书监权直学士院王曦撰奏桧之加恩诏制,取熊叔雅之语入词中,语云:“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20]卷4,第55页}讨得秦桧欢心的王曦第二天即升礼部侍郎。韩侂胄欲使心腹苏师旦为节度使,国子司业兼直学士院易祓“草麻,极其谀佞”,便由司业而迁谏官^{[16]卷11,第200页}。王、易二人可称为“润笔侍郎”“润笔谏官”。

三、朝廷对翰林学士交结宰辅的防范

诚如上文所说,翰林学士与宰辅重臣彼此互利用的事并不鲜见。宋初,朝廷对翰林学士与宰辅的交结是非常警惕的。太宗时,有人说深得宠信的两翰林学士张洎、钱若水“旦夕当大用”,同知枢密院事赵昌言说:“(张)洎必参政柄。(钱)若水后进年少,岂遽及此。”张洎害怕有人“拘飞语中己”,便将此事告白于太宗。太宗对宰辅随意发表翰林学士日后人事安排的意见很警觉,相关人员因此遭到了惩处^{[4]卷267《张洎传》,第9212页},他可能是担心翰林学士与宰辅存在政治利益的交易。真宗朝,翰林学士朱昂“非公事不至两府(中书门下和枢密院)”^{[5]卷48,第1059页}。寇准在中书,召集包括翰林学士在内的“两制会饮私第,酒酣气盛,必闭关苛留之,往往侵夜,畏谨者甚憚焉。”^{[5]卷76,第1378页}之所以有人“甚憚焉”,当是因为真宗皇帝忌憚朝臣与宰辅的交结。又据《梦溪笔谈》卷九载,向敏中拜仆射日,真宗遣翰林学士李宗谔去其府上探听虚实,看是否有宾客前往庆贺。好在向敏中行事谨慎,并无一人前来相贺。真宗对此极为高兴,称道向氏是足可胜任此职的。在这种背景下,严于律己的翰林学士自然很注意处理好与宰辅的关

系,如仁宗朝的翰林学士冯元“性简厚,不治声名,非庆吊未尝过谒两府”^{[5]卷120,第2831页}。

为了防止翰林学士与宰辅交结,自真宗以来形成的回避制度得以强化。仁宗至和二年七月癸亥,翰林学士欧阳修“请自今两制、两省以上,非因公事不得与执政相见,及不许与台谏官往还。”欧阳修不仅重申了翰林学士(两制官)不得私下擅见宰辅,而且把禁令所及的范围扩大至台谏官。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第二天,知谏院范镇对这一规定提出了不同看法,说:“近日有诏,两制臣僚不得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间见宰相,是不推之以诚,不任之以权。”范镇主张解除禁令,可让翰林学士等人“就第间见执政”,但意见没有得到朝廷的采纳^{[5]卷180,第4356-4357页}。

仁宗嘉祐元年四月,针对“诏两制、两省官惟公事许至中书、枢密院见执政”的情况,知许州的贾黯上疏指出:“他官皆得见执政,而侍从、近臣反疏斥疑间如此”,是对两府大臣不以“赤心”相待的表现。于是,朝廷“追寝前诏”,改变了以往的做法^{[5]卷182,第4406页}。嘉祐四年五月,仁宗下诏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务,而过设禁防,疑以私慝,非朕意也。旧制,两制臣僚不许诣执政私第……除之。”^{[5]卷189,第4564-4565页}嘉祐六年正月,权御史中丞王畴指出:“比岁两制臣僚,不得与执政相见及台谏官往还。议出一时,初无典故,当时论者即以为非。”这种禁令原本出于权宜,并非“祖宗之法”^{[5]卷193,第4661-4662页}。

尽管如此,两制与宰辅往来这一问题仍难以真正开禁。《宋史·冯京传》载:冯京“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数月不诣丞相府”。冯京依旧遵循“从官不妄造请”执政之规定。冯氏两度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第一次是在嘉祐八年至治平二年五月,第二次在熙宁三年,时间很短,当月即离任^{[1]第264页}。冯氏为翰林学士时,不得诣执政私第的旧规早已不复存在。《名臣碑传琬琰集》下集卷十六《冯文简公京传》载:“韩琦当国,(冯)京数月不一见,琦谓京傲,以语富弼。弼使往见之。京谓琦曰:‘公为宰相,而从官不妄诣公,乃所以重公,岂傲也哉?’”宰相韩琦以翰林学士冯京不去拜访,说冯有傲气,冯以翰林学士(从官)不得随便造访宰相私第为由作为回答。这表明,翰林学士不得与宰辅随意往来的规定仍然有效。有趣的是,这一规定的执行即便在同一朝也因人而异。王安石主政的神宗熙宁时期,他荐用的翰林学士就是与其政见一致的党徒(详上),执政与翰林学士相交结的禁令只是一纸空文。但对无当轴

重臣护佑的翰林学士则是另一番遭遇。翰林学士沈括“诣宰相吴充陈说免役事,谓可变法令”,御史蔡确指责沈括越职言事,目的是想“依附大臣,巧为身谋而已”^{[21]卷86《沈括传》}。蔡确指沈括“不公言之而私语执政,意王安石既去,新法可摇耳”。沈氏因此黜知宣州^{[4]卷471《蔡确传》,第13698页}。

宋朝还有一规定,如亲属为宰辅,翰林学士须改任他职。周必大说:“祖宗时,内制多避两府亲嫌。”^{[22]卷下,第129页}翰林学士遵循“祖宗之法”的事例甚多。仁宗庆历五年二月,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祁改为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避兄(宋)庠执政也”^{[5]卷154,第3746页}。王洙为翰林学士,其从子王尧臣为参知政事,嘉祐元年闰三月,王洙便改任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5]卷182,第4399页}。神宗熙宁七年五月,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韩维因所言未被采纳而请辞,恰好其兄韩绛为相,便依“故事”外任而出知河阳^{[5]卷253,第6195页}。徽宗即位,曾肇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其兄曾布为相,依故事当“避禁职”(翰林学士),曾肇便为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4]卷319《曾巩传附曾肇传》,第10395页}。绍兴初,翰林学士范冲因丞相赵鼎为其姻家而改为侍读学士。当然,“亦有不许避者”^{[22]卷下,第129页}。如哲宗绍圣年间,蔡卞拜右丞,其兄蔡京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4]472《蔡京传》,第13722页};徽宗崇宁三年,张康国为翰林学士承旨,拜尚书左丞,其兄张康伯代为翰林学士^{[4]卷351《张康国传》,第11107页}。蔡京、张康伯二人均没有回避。直至南宋秦桧为相,其兄弟秦梓为翰林学士,其庶子秦熈也为翰林学士承旨,仍然没有回避执政官亲。叶梦得有一解释:宋朝两制先前均应“避宰相执政官亲”,但至苏轼元祐年间任翰林学士承旨而没有避执政苏辙,这一禁令便打破了。至叶氏所处的时代,朝中为官者只需避本省官,例如属尚书左右二丞的执政官,其亲属不能任尚书侍郎,为门下侍郎的执政官,其亲属不能任给事中,为中书侍郎的执政官,其亲属不能用为中书舍人^{[23]卷4,第50页},两制官则是可以不避执政官亲的。

翰林学士与权臣的交结本就难以避免,而翰林学士不得因私事面见两府以及必须避执政官亲的制度荡然无存的时候,只会为小人作奸开启了更为方便之门。蔡京、秦桧专政时,翰林学士与其沆瀣一气的事实就是明证。

四、结语

宋代翰林学士的两项主要职责即草诏和顾问,他们对宰辅政治的影响主要有二:一是在宰辅的人事变动上可发表意见,供帝王决策时参考;事实上,

确有宰辅因翰林学士向帝王建言后或罢免或升迁。二是对拟(现)任的宰辅,代帝王言的翰林学士草拟诏制时如用“美词”,有利于增强其位至要路津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对不认可的拟任宰辅,翰林学士也可拒绝草拟诏制,即宋人王明清所谓的“禁林缴奏”^[24]卷15,第296页,这实则是翰林学士利用草诏权来干预宰辅的选任。例如,真宗天禧四年十一月,翰林学士刘筠不愿奉诏草拟丁谓复相诏麻,朝廷只得改用另一翰林学士晏殊^[5]卷96,第2224页。孝宗乾道八年,翰林学士周必大因对朝廷任用张说、王之奇为签书枢密院事有不同看法,而拒绝为二人草拟辞免不允诏^[6]李壁《周文忠公行状》,第293册,第399页。正因为翰林学士在政治生活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一些具有机心的宰辅或与翰林学士结盟,或直接插手翰林学士人选的布局,以便这一特殊群体为己所用,而一些翰林学士也乐于倚傍宰辅,成为所依附的权臣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当然,翰林学士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也有所收获,因攀附宰辅而位至执政的也不在少数,成了名副其实的中枢决策机构里的政治人物。这一特点,在权臣当道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翰林学士号称“内相”,帝王赋予他们常人所没有的特殊的权力,目的是为了平抑相权。当翰林学士与宰辅走得亲近时,便会招致皇权的约束:(一)翰林学士“非公事不得面见执政”,即使在处理公务的中书门下相见都属犯禁,更不用说私邸了;(二)翰林学士须“回避执政官亲”。然而,这些规制只是在北宋前期执行得较好,这与帝王个人控制朝中局势的能力有关,皇权相对强势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执行力好于此后各朝。规制的第一条,仁宗嘉祐年间以后一度被废;第二条,在哲宗时期即开禁。至徽宗、高宗两朝,由于权臣蔡京、秦桧当道,约束的禁令成了具文。此后,直至宋末都未能加以改变。

宋代翰林学士影响宰辅政治的能力,得以皇权作后盾;皇权的强弱,决定了他们作用的大小。成为权臣附庸的翰林学士,在朝廷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更无独立性可言。即使翰林学士成为执政官,也得受制于权相;如果得罪了权相,罢免自是难免,像秦桧独相时期的孙近、楼炤、范同、杨愿、段拂等人即是如此。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擅权时期的宁宗、

理宗、度宗三朝中的某些翰林学士,与这些权臣的关系极为密切,企图靠“内相”来平抑相权,无异于痴人说梦。总之,宋代翰林学士在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如唐代翰林学士的。

参考文献:

- [1]唐春生.翰林学士与宋代士人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2]唐春生.“以文驭武”:宋代翰林学士与宰辅的选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7-31(A05).
- [3]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6]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7]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 [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0]叶梦得.避暑录话[M]//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1]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2]蔡崇礼.北海集[M].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1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4]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5]王銍.四六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6]周密.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7]刘壎.通居通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8]陆心源.宋史翼[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9]徐度.却扫编[M]//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0]李心传.旧闻证误[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1]王偁.东都事略[M].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22]周必大.玉堂杂记[M]//傅璇琮.翰学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 [23]叶梦得.石林燕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4]王应麟.困学纪闻[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于湘]